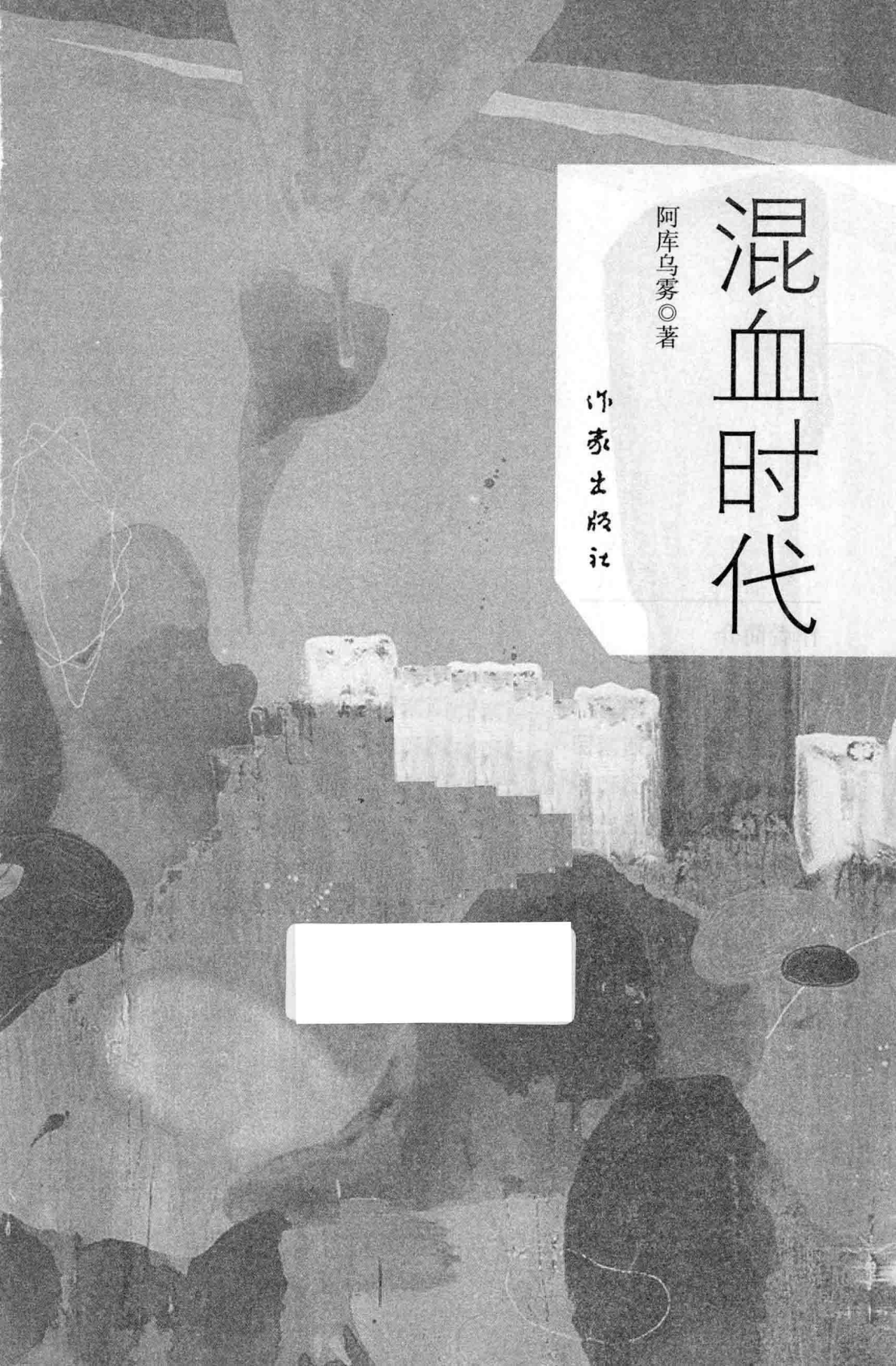


混血时代

阿库乌雾◎著

作家出版社



混血时代

阿库乌雾◎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混血时代 / 阿库乌雾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063-7973-1

I. ①混… II. ①阿… III. ①散文诗 - 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87992号

混血时代

作 者: 阿库乌雾

责任编辑: 徐 乐

装帧设计: 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12

印 张: 14.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73-1

定 价: 2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文

在混血中寻求美德

——论阿库乌雾的民族志诗学

耿占春

彝族诗人、学者阿库乌雾把这个时代命名为“混血时代”，他对文化之“混血”怀着充分的理解和极其矛盾的情感。对此，阿库乌雾一方面从文化史角度进入认知性的思考，又从个人偶然境遇的隐秘感知加以抵抗性的表达。阿库乌雾的文化思考经常与细节的感知处在复杂的甚至相互悖谬的关系中。可以说，他一边充满信心地探索这个混血的时代，描述着它花样翻新的融合与创新方式，一边感受并表达着一种由于语言、文化的混血所带来的“危机四伏的生命伦理”。由于这一洞察，阿库乌雾的写作与通常的研究者对母语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叙事不同，与博物馆化的保护叙事不同，他看到的是许多河流的汇聚，许多文化“血缘”的混合，完整性与纯粹性已经构成了它自身的神话，而不是可能的现实，也许他心中有着对逝去的“纯粹性”的惋惜与哀悼，但总体而言，他审慎的目光依然是前瞻性的，注视着、描述着“混血”状况及其之后的流向。

一方面阿库乌雾知道“血缘纯正的尊严，让种谱之树适时萌

芽，直至枝繁叶茂”，同时他又提醒“嫁接”的果实更为甘美优良。混血成为族群和人类强盛的理由，他说动物界鲜有混血，“惟有人类具备超越种族、超越地域、超越年轮的繁殖能力，于是，混血的责任，天命地落到人类的肩头”。但他又坦诚地说出另一种感受：当一个混血儿在其彝族母亲的提示下称呼他一声“舅舅”，“我瞬间变成掉进古人暗设的陷阱中的一头困兽，我无意中遭遇他那幽蓝的目光，仿佛与神话世界里祖先的敌人的眼光神似，从此，我的心灵莫名地抽搐不止”。理论的认知难以消除情感的反应，而情感的反应中也隐藏着一个自身的陌生人。在概括性的叙事之时，不忽略经验与细节，不减低个性的偶然境遇的叙事，是思考难以保持的一种美德。也许，这就是哲学所孜孜以求的“辩证法”，或本雅明、阿多诺所热爱的思想的“辩证意象”，这也是阿库乌雾作为诗人的思想直觉。

在思考和描述“混血时代”时，作为诗人和学者的阿库乌雾在这部书中从其“母族文化的现实境遇”出发，以日常生活中的物象，结合个人意念和想象中的意象，试图捕捉“内心真实中那些稍纵即逝的个体生命的深层欲望和独特的精神信息；试图显示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当代世界正在遭遇的人性共通性与人类普世性命题的参与能力和精神能量”。因此这部书不是一种观点的推演，而是在纷繁的世象或意象中思想洞察与诗性直觉的闪烁：力图在混血的文化境遇中寻求人们能够产生普遍认同的美德。也就是说，阿库乌雾对民族文化的思索既有回溯性的目光，更有着前瞻性的洞察。当然，他也为我们留下许多的难以解答的困惑。其中一个困扰与悖论已经出现在阿库乌雾的自我意识之中：一种民族

文化的逐渐式微和一个彝族诗人学者的成长。他很难协调这种衰落与生长，就像难以判断“纯正”与“混血”的结果。阅读这位彝族诗人学者的书，可以感受到，阿库乌雾保持着情感上的纯正，又拥有智性上的混血。而我对阿库乌雾的解读也将随着这位彝族诗人学者的纷繁意象而形成一种非线性的、非推论性的思想叙述，保留着他对处境的细致描述与辨识，也提示着认识路径的模糊性与多重歧义。

一、族群与个人

族群区分有着一些最古老的涉及个体与群体身份认知的文化标识。一个族群将自己的出身追踪到某种动物是一种奇异的智慧。它借助一种图腾符号区分于其他族群，却又将自己认同于一种与人类生命更为不同的生物类型。图腾包含着区分与认同的辩证法。也许可以说，一个部落、一个族群认同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是一种神话诗学的叙述，而区分于另一个部落或族群是一种宗教社会学和历史语言学的叙事。阿库乌雾在《熊人》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史诗《勒俄》的《雪子十二支》一章中记录得很清楚，鹰、蛙、蛇、熊、猴这五种有气有血的动物与人类同宗同源的图腾史。”后世的人们对图腾的认知却是十分模糊的，神话的谱系有时已成为混乱而充满暴力的族群观念的一个模糊替身，“对自己祖先的历史一知半解的凶手”、一个“自称鹰的后代虎的后代”的凶手，“居然忘记了熊也和我们祖先同源”，却不知道这个谱系中根本就没有虎。阿库乌雾揭示了关于民族记忆一种普遍的处境：神话叙事

早已模糊，宗教社会学的思索也未成熟，图腾符号已分崩离析为一种关于族群或种族意识形态的可疑的知识碎片。

作为一名学者，阿库乌雾知道“族群”意识的价值：种群认同意识的存在，吸收化解着个人的孤单、脆弱和寂寞。种群是孤独、脆弱的个人的一种归属，这种归属感既存在于一种熟悉、信赖的地域、空间特性之中，也存在于历史与记忆的共同体情感及其叙事话语之中。就当今世界而言，共同体的情感意义常常大于其真实的利益需求。但他也知道族群观念和它的象征物也并非是全然无辜的，他在《旗帜》一节中如此写道：“浴血的战场，当战争双方的士兵先后战死沙场，那代表战争最高利益的旗帜必然沾满了鲜血，而那些斑斑血迹正在残存的血旗上构拟着新的图案和文饰。此时，我看见成群成群的苍蝇和牛虻嗅到血腥，迅速从四面八方赶来，疯狂地吸食着那布满弹孔的旗幡上英勇无畏者残留的血迹。”阿库乌雾这样形容作为族群的神圣标帜：“旗帜是撰写谎言的帛书，旗帜是释放欲望的花朵，旗帜还是裹尸布。”与那些著名的人物、墓地与纪念碑之类的事物一样，旗帜是族群的圣物之一。但不容忽略的是，这些圣物总是与谎言、欲望、死亡联系在一起。如果人们不传播民族神话，如果不把凡俗的事物神秘化，不把利益遮掩在动听的谎言中，如果不制造一些神话性的符号与叙事，屠戮与死亡就不会变得神圣。

阿库乌雾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当他讽刺一种事物的时候，他也会转眼看见其亵圣的一面；当他赞美某种事物时，他即刻又意识到他和他赞美的圣物已经遭遇一种语境化的讽刺或解构。对圣物的反思不仅来自圣物与暴力、欲望、冲动的关联，圣物在当代

社会已遭遇着一种讽刺性的语境，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圣物与符号不再具有它固有的象征意义。因此在他抒情的时候，他的音调又会转向反讽：“我以祖先的名誉打着锈迹斑斑的旗帜，躲藏在城市的角落，我的旗杆上发不出嫩芽，周遭的人们不再领会我的旗语，我的旗面上爬满时髦的蚊虫，生存犹如一只毒蝎，正在剥夺我成为合格旗手的资格。”他意识到自身早已不是神圣象征物的合法继承人，他发现了作为族群圣物已失去了圣灵的意义：“从此，我们不腐的旗杆不再是阳具的象征！”圣物所具有的意义会投射到人们身上，圣物或它的象征物所遭遇的反讽也会把意义的消失带进人的有缺陷的生活。

阿库乌雾理解自己民族的方式是独特的。他常常通过一些圣物、符号和器物，通过一些物质化的符号，解读出它们从神话诗学、宗教社会学的精神向度朝着族群的意识形态化衰落的寓言化进程。这是一个诗人的理解与阐释方式，他从圣物与器物的符号学解读开始，又触及一种从生活意象和历史细节中所产生的独特的认识。他在谈论音乐的“和弦”与“独奏”时赋予了这样两个音乐概念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意义，成为族群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富有洞察力的表达。他如此描述着飘荡在山野和人们心中的音乐：

是古朴而精妙的独奏，唤醒了我们的生命，养育了我们的性情，表达了我们的诗思，给我们插上智灵的翅膀，几千年如一日，在高原与山谷之间亘古地盘旋。

独奏，曾让我们丢失广袤的平原，退居山林享受自尊与孤寂；独奏，同时带给我们原始的美丽与孱弱的野

蛮；独奏，引领我们的生命无数次地错过换一种方式呼吸的契机。我们四周险象环生的树木与荆棘，习惯于独奏中蔓延；我们刚刚诞生的婴儿，习惯在独奏中哺乳；我们的母亲，习惯用独奏暗示自己内心的秘密；我们的父亲，习惯以独奏杀伤猎物和自己的敌人。（《和弦》）

“独奏”在阿库乌雾寓言化的叙事中是个体生存的表征，独奏是个人最真实的声音，独奏意味着个体的人温和忧伤的性情，内在省思的尊严，与万物为友的灵智。而这些与音乐的陶冶不可分离的性灵，正是对个人价值的深刻揭示。没有独立品格的个人、没有内心自由的个人，一种语言与文化就难以发展出这些充满灵知与温情的人文精神。但阿库乌雾旋即又意识到，独奏、即个体化也培育了孤独与孱弱，削弱了群体聚合的力量。不仅因为独奏者是一个敏感的个人，他也会把对方、他人或敌对者视为具有同样内涵的人，具有相似命运的不幸而无辜的个人。他如何能够在“独奏”培育的情感中忘却仁慈、进入“蛮勇”？如何只看见族群的“图腾”与“旗帜”，不注视对方的眼睛？可以想象，内心充满独奏式情感的人，充满古朴而精妙音乐情感的人如何能够在族群“旗帜”的指挥下奋勇杀戮，哪怕是在保护自己的土地？诗人对此怀着深深的矛盾情感：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加深知和弦的尊贵，期待用和弦改写我们抒情的历史，我们至今依然保有对和弦永恒的渴望。

让我们放弃独奏，似乎已没有可能；同样，让我们拒绝和弦，似乎也不再可能。那就让我们彻底放弃音乐吧！让我们以放弃音乐的代价，换取我们的生命一次真正的尊严吧？！（《和弦》）

作为一个诗人，阿库乌雾深深懂得并热爱自己民族“抒情的历史”和音乐般的个体的美学与道德意义；但作为一个学者，他怎能不知道一个抒情的民族在生存空间的争夺中所付出的代价？独立自由、内心丰富、抒情的个人，与民族共同体的责任与命运，既维系在一起，又充满矛盾与复杂性。从理想、理性的意义上说，“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但与此同时，尤其从回溯性的民族主义精神而言，最原始的生存竞争常常是以族群为单位的，就像战争主体常常是民族或国家一样。价值选择的困难使诗人陷入复杂的自我意识。背靠着、背后是一个相对弱小的族群，它有着自己充满挫折和失败的历史叙事，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纠结在一起的问题怎样成为一个真诚的诗人所必须承担的思想使命：“千百年历史的承重包袱 / 仿佛是个人的过错 / 压得我喘不过气。”（《蜕变》）

这些思考将指向一个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提问：是不是将“独奏”、将个人视为一种更基本的价值，在不同规模的族群利益冲突的历史之后，是不是应该寻求一个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更具普遍价值意识的、包容着各种不同族群的共同体？对阿库乌雾而言，理解与阐释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最终仍然是对更为普遍的人类共同体所依赖的价值观的探索。

在阿库乌雾关于个人与族群的众多“辩证意象”或概念的星

座中，“爱情”与“生殖”提供了另一种富有深意的比喻式的论证。在诗人看来，爱情“就是自我发掘中发掘我们高贵的种族和美妙的性力的过程”。与之相反，诗人极富洞见地指出：“而生殖是爱情的麻醉剂，制剂者常常以自我麻醉的方式来企图麻醉别人。其醉人的成分来自种群繁衍的伦理，麻醉之后就会使天性狂躁的身心走向集体的沉静。”他的预见无疑是一种历史回顾：“而长久的沉静似乎预示着生命的终结！”这是否意味着，个体情感、个人爱情的伦理高于种群繁衍的伦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族群繁衍的伦理深深地植根于个体生命的伦理之中。在爱情的谈论中，这一结语于个人与族群都是意味深长的——“……其实，爱情就是对生命终点的提前觉悟！”（《爱情》）个人的最高价值与认同是“爱情”，而族群的最基本目标是“种群繁衍”，二者相互寄生又充斥着矛盾：无论哪个民族，请想象一下它的历史中发生过多少以族群繁衍的伦理与习俗惩罚那些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而后者总是可以向更普遍的人性、超越民族文化认同的普遍情感共鸣求助与投诉？

阿库乌雾的这些叙事与讨论将把我们带向这一视域：关于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关于个人的价值认同，我们正在从传统的血缘关系的“民族”“宗教民族”的单一范式内，面临着向“文化民族”和“政治的民族”这样一些正在出现、将会出现的新的共同体的转换。这意味着，个人所寻求的归属，并非传统的血缘性的共同体，而是对更具普遍的价值观及其更为合理的社会规范所产生的认同。亲缘关系的族群认同只是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最私密的情感意味的美好事务。

二、汉语和母语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少数族裔的个体一直生活在一个情感的、血缘的也是地域的、语言的共同体，和另一种更大的共同体之间。当更大的共同体缺乏合理性的时候，这不像是一种生存空间，不是个人的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更像一道夹缝。阿库乌雾说：“我来自母语与汉字之间剩下的最后一道裂缝。”（《尘埃》）这是一个同时以母语和汉语写作的诗人内心自白。我曾听到阿库乌雾说过他少年时代学习汉语的经验，他以为语言所说的为真，以为词汇是事实，他以为语言是诚实的。可是当他听到被众多民族每天齐声祝福“万寿无疆”的神死了，这使他感到惊讶：汉语在说谎。汉语的真实性顷刻间被瓦解了。当然他暂时还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要集体撒谎，为什么有人喜欢谎言，以及语言与事实是什么关系。语言似乎与谎言有关，与愿望有关，与逢迎献媚有关，却与事实无关。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意识到“汉语是骗人的”。他意识到汉语是充满暴力的：“因为一直难以理解汉语‘杀人不见血’的意思，我久久注目手中锋利的刀刃，琢磨为什么汉语可以做到‘杀人不见血’而我的母语不能。”（《利刃》）

作为一个敏感的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更进一步意识到：“汉语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最擅长用暗器伤害对手而使对手毫无觉察的锋利无比的语言之一。”无论从统治还是从反抗的角度看，汉语都充满了“明枪暗箭”“投枪匕首”，这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考察对象。而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汉语正值“革命”、运动与战争漩涡，不只是

十年而是近百年，恰值现代汉语的生长阶段。革命、战争、战役的比喻钩织着现代汉语的象征结构，敌对和敌人以及它的邪恶化、妖魔化的人格化无处不在，因此语言成为武器受到暴烈的崇拜，作为暗器受到频繁地利用。似乎语言不再是交流、理解、协商与沟通的媒介，而是相互伤害的“利刃”。

更普遍的语言伤害行为来自取消个体特性的命名，事物专有名称的普遍减少，来自于漠视个人的抽象范畴的神圣化。更普遍的语言暴力存在于专有名称的消失，来自于一些民族母语的逐渐衰亡，或许这亦是“杀人不见血”。“此间，英语继续在世界各地肆虐无度尸横遍野，这些地方是不是有锋利的刀刃在某位诗人的手中紧握？”当语言成为“工具”并进而成为“利刃”与武器，甚至连某些诗人也幻想能够用利刃来进行反抗：“毫无疑问，利刃可以获取自由，利刃可以剥夺自由。如果自由是生命的目标，如果利刃是游戏的部分，如果游戏是自由的前兆。那么，谁掌握刀柄谁就操控利刃，谁就可以占有自由，或者买卖自由，或者创造更多的自由。于是，自由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向了反面。”阿库乌雾以“利刃”这个词语形象反思了工具论语言的政治意义，反思了武器化、攻击性的语言的社会伦理意义。尽管他愿意想象一个诗人的目光也许会让利刃像“山顶的积雪”一样融化，“利刃，依然在我的目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阿库乌雾意识到自身“久久执迷于汉字的深壑与险滩，我的躯体明显缺乏固有的定力”，但作为一个同时用汉语写作并获得认同的诗人又意识到这一事实：“我的王冠当然来源于汉字的余晖，可我身体里腐朽的品质，同样归功于那些锈蚀的汉字。”（《珊瑚》）

这意味着阿库乌雾对汉语同时拥有另一种更复杂的、有时又是充满诗意的体验：

如此铿锵的汉字潜入我的心底，正如我在梦里无数次地沉落不可名状的汪洋，体验一种立体的虚空和虚空之后的惊悸。

……

或许是如此动听的读音丰富了“珊瑚”的内涵？或许是从“珊瑚”的生命中提炼了这两个美妙的音节？面对汉语的美，我再次成为贪婪的蛇蝎，将自己从祖先遗传的毒液无休止地喷吐着，击中我的食物，偶尔也伤害我的子孙。

来到这个世界，我打着一面一面小小的汉字的旗帜，去到森林和海洋，寻找我命定的生命的火把，犹如我难以脱逃的命定的姻缘毫无破绽的完成了我的肉身在这世间的完美。忽然间，我似乎获得神示般的通达：珊瑚在我身体里的力量，不都是因了她那自由往返于两种生命形态之间神奇的天分么？！

我的祖先有格言道：人与人的差异，天壤之差；动物与动物的差异，微不足道。（《珊瑚》）

对一个能够以汉语思考、写作的诗人来说，异己感不是仅来自于不同族类的区分意识，而是来自于一种语言中逐渐强硬起来的非自然元素，恰如阿库乌雾所说：“其实，只要与水有缘，吸收了

水的全部的性灵与智慧，生命就不可以再做简单的分类。”（《珊瑚》）

“珊瑚”的意象中包含着“语言”的形象，只要处在水、生命源泉之中就不至于成为死的东西。这是“母语”更深层次的涵义。

诗人触及一个致命的问题：语言的谎言化、工具化与暴力化。与“母语”所携带着的水的意象或温暖家园意味相反，在语言被利刃化被工具化的时代里，一切“母语”都在偏离自己的保护性，而倾向于使用它更锋利的工具化的一面。

“……万幸，那些假肢都是用外语安装的！因为外语始终是他人的母语！”（《假肢》）诗人设想，“我假设自己是万能的毕摩，模仿电影电视里的方法，给那些丧失母语能力的彝族人，或者他们所穿的服装，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和生活器物，以及他们留在地上的脚印和装在心里的梦想都安装上用汉语或英语制作的精美绝伦的假肢。”——在诗人看来，人们所掌握的他人的语言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假肢”，没有生命的体温，缺乏有机性——“我再次假设自己是技艺高超的工匠，试图在那些正在遗忘母语的人的骨质中拧进一些用金属、钢化玻璃、强化木或塑胶做成的零件，让他们深刻享受科学的成果，充分体验科学的乐趣，让他们原本就无比坚硬的骨头更加坚硬，从此不再继续单纯得不堪一击的历史。”事实上，每一种语言都在淡化它的母语特性，淡化母语固有的心念、情绪、内涵，淡化母语所包含的对事物的富于体温的感知，而急剧增加着语言的工具性。语言不再是情感与内心的一个故乡，甚至连母语也不是。语言日渐成为支配性的工具，成为极具功能性的“利刃”与“假肢”。但诗人由此预感到了“故乡的河流全部丧失了倒影的能力，紧接着所有的人与物瞬间丢失影子。我预感

渴望影子的时代来临！”（《假肢》）

伴随着语言的功能化需要即“假肢”化，语言加剧了脱离自然的倾向，词与物在脱节，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遭遇着进一步地分解。“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经典，都会跟一些动物或植物的生命与习性有关，同时，人类又不断地使这些物种的生命和特性在逐步靠近人的需求的过程中走向衰微和枯竭。”（《乌鸦》）时至今日，人们创造了诸如“铁乌鸦、铜乌鸦、塑料乌鸦、玻璃乌鸦，甚至纳米乌鸦或电子乌鸦”，除了借用“乌鸦”的声音、词汇和文字符号外，再也难以让后世的子孙想象天然乌鸦的生命的姿态、活力与内涵。词与物的脱节，事物与意义的脱节，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未来命运呢？

人们会由于掌握了工具性的语言而变得有力量了，但是“将来他们生下的孩子会不会都成为金属孩子、玻璃孩子、塑胶孩子呢？！至少会有金属舅舅、玻璃叔叔、塑胶阿姨等等了！一条拒绝血液的新的家族的谱系诞生了！”（《假肢》）阿库乌雾洞察到人们脱离“母语”，即其语言脱离了自然感受力，脱离了情感记忆和历史记忆，就像远离了母性的孕育与保护性。在掌握着纯粹技术性的、工具性的乃至“利刃”式的语言时人们的心性与心智将产生的令人恐惧的变异。“城市深处，巨人的指纹延伸为四通八达的迁徙线路，属于灵魂的物质，终归被象征，被封存，言说终止。”（《大泽》）在阿库乌雾看来，母语就是这种“属于灵魂的物质”的象征之一，但越来越多的“母语”终归“被封存”，被博物馆化，残存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学院系科里，成为一些非凡的“绝学”。

阿库乌雾就是这样一个拥有母语记忆、拥有毕摩的神圣知识，

掌握着“绝学”或“圣学”的文化保管人。但他知道，母语文化的“抢救”“保管”都只能是对活的文化的博物馆的认同而已，而不是一个诗人所渴望的，流注在人的血脉之中。因此，阿库乌雾也就多了一份对母语文化薪火传递的忧虑：“当我们面对丧失母语的孩子洋洋得意的神情，我们用什么去照射出他们的苍白？内心毫无信仰的族人行色匆忙，我们拿什么去劝慰他们的灵魂？”（《镜子》）作为一个学者，阿库乌雾感受着一种悲伤，他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的挽歌作者。然而作为一个诗人，他始终没有放弃一种希望，那就是语言、文字在他的笔端获得其自身灵性的时刻。他身上的学者所肩负的也许包含着“抢救”“保管”“守护”的职责，然而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最高使命是致力于新的精神价值的创造，致力于正在被博物馆化的文化重新焕发山野之间的生命力：

被目光翻晒过的书页更见夺目，大概是文字跟羽毛也有过早期的联姻。据说故乡森林中那些雄锦鸡彩霞般鲜艳的羽衣，正是为了博得雌锦鸡的欢悦而长成的。而我以什么去获得我的文字对我片刻的欢悦呢？我沉重的生命什么时候能够插上飘飘欲仙的文字的羽毛呢？！（《羽毛》）

三、技术、城市与自然

每次转换一个题目时我都意识到，阿库乌雾的民族志书写